

彭华

泰西之学的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思想发生的重大影响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汉晋佛学的东渐，一次是近代西学的东渐。而本世纪西学的东渐则对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甚或有人断言，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代的学者，若不谙西学将是极大的遗憾，以致提不出带创性的问题，也解决不好他人所提出的带原创性的问题。援引西学对中国学术研究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但换一视角冷静而观，当代学人援引西学以助中国本土学术研究并非做得尽善尽美。翻阅当今报刊杂志图书，便可发现“舶来”的名词术语充斥其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参照西文原著细加考究，便可发现在汉文话语系统中援引的部分西文术语已与原义或大相径庭，或南辕北辙，徒然为装点门面，炫耀学问之用。此诚不足为学术研究所取，也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

科学研究的规范可作如是观：在具体而微观地探索某一问题前，对欲加以使用的术语必须予以严格界定，使其在作者建立的一套话语系统中有确凿的含义，至少没有歧义之嫌。西方学者赖以建构其话语系统的是西方文化背景和他个人的认知图式，而非中国式的。有鉴于此，中国学者在援引西学之前，必对其做如下工作：①对语言的梳理，弄清其来龙去脉，以便于对译成中文，无法对译可以西文代之；②对意蕴的澄明，力图在具体的上下文(context)中全面理解和把握其含义，义理不明而加以翻译和使用，将是驴唇马嘴，无法对话和交流；③对现实的可行性检讨，纯学理的抽象的可能性，与研究使用时具体现实的可行性不可等而视之，削足适履和削履适足都不可取。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伐柯》）。陈寅恪、钱钟书二先生的身体力行当对后学有所启迪。陈、钱二先生饱受西学的熏陶，又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但在中学西学关系的处理上却恰当妥贴，直臻圆融无碍（借用佛学术语）的境界。在陈先生的论著中几乎没有西方学术术语，但并非陈先生不谙西学，而是圆融会通于其论著中；钱先生的原则是，中国已有足以涵括其义理的名词术语，则毋须再援引西人术语，因而在《管锥编》等论著中虽援引西学，但其译文却是地道的中文，打通中西而又无生硬梗塞之感。若此慎重而为。此诚“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1997年2月6日第三版。署名“彭印川”。】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